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新潮

民初时论选

张骏严编选

新潮

The
Renaissance

第一卷 第一號

民國八年四月四日出版

北京大學出版部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尊隐 大同书

默觚 仁学

采西学议 建国方略

使西纪程 砭旧危言

弢园文录外编

洋务议 恤书

盛世危言 新民说

论世变之亟 猛回头

新政真诠 睡的人醒了

强学一戊戌时论选

民声一辛亥时论选

新潮一民初时论选

(辽)新登字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潮:民初时论选/张骏严编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57-4

I. 新…

II. 张…

III. ①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②政论-中国-近代-选集

IV. 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96,000 印张: 10 $\frac{1}{4}$ 插页: 5

印数: 1-1,587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长勇

版式设计: 赵耀今

封面设计: 赵多良

责任校对: 刘涛

定价: 10.80元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编 序

1915年9月,《青年杂志》(一年后改称《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其内容新颖独特,犹如给沉闷的思想教育界吹来一股清风,很快就不胫而走,成为广大青年最热爱的读物,它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文化运动在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下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空前广泛深入的批判,同时,随着运动的发展,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也作了有力的揭露。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的失败是触发这次运动的直接动因,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中华民国”的招牌挂起来了,《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庆幸着表面的胜利,以为“大功告成”,此后努力的目标,只是政治建设和实业建设,更有部分人以为清朝的异族统治被推翻后,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话流行一时,这类思想,对革命势力起到涣散瓦解的作用。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随着袁世凯的上台,与共和政治精神相背的不谐之音便开始奏响,并逐渐喧嚣于国中。这

种不谐之音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思想文化领域尊孔复古思潮的兴起；一是政治领域复辟帝制的活动。毫无疑问，民国后的复古思潮及复辟帝制活动是一股逆流，然而，在一定时期，这股逆流弥漫乃至主宰了中国，把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吞噬殆尽。一度陶醉于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被一连串严峻的现实唤醒之后，重新投入了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孙中山、黄兴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月革命”；章太炎、黄兴积极进行反复古思潮的斗争；……。但是，武装斗争迭遭失败，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反复古思潮斗争也显得缺乏声势和力量。历史在期待着新的角色登场。

新一代知识分子是高举着思想启蒙的旗帜登场的，这与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化历程特别是民国下社会现实的认识密切相联，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界的领袖人物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等，在辛亥革命后，均经历了一个从满怀希望到失望的思想历程。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就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自己担任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活动，但是，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也被迫逃亡外地，可谓“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无疑，这段经历促使陈独秀考虑思想启蒙问题，《青年杂志》一创刊，陈独秀便坚定地号召人们，特别是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

也”^①。占据陈独秀头脑的不是直接的政治革命，而是对思想观念变革的热忱期待。这种认识凝聚着陈独秀们对辛亥革命后社会现实的思考，同时也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思想观念变革是决定国家、民族进化的关键。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一批不同程度地受民主主义熏陶的爱国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了。民国的建立和对教育制度的初步改革，促进了新式的现代性质教育的发展。1915年与1909年相比，学生由164万增加到430万，从总体上看，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已与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重大差别，他们多少都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懂得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和西方民主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加上20世纪以来，到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学习的留学生增长较快，绝大部分留学生通过异域的经历深刻感受到民主和科学的重要性，一支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队伍出现在民国初年的中国，这是新文化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推行的一些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忙于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对中国经济的压制有所放松，但是，封建军阀仍用各种方式摧残着很脆弱的民族工商业，帝国主义仍然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命脉，在社会生活中，各种腐朽的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已经壮大了的资本主义要求批判阻挡它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30页。

前进的各种障碍，一场新旧思想文化的搏斗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919年1月，当新文化运动已进入高潮时陈独秀在回答守旧顽固派对《新青年》的攻击时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①陈独秀从批判传统文化角度，概括了新文化运动前期进行的几项具体工作，所有这些，又可视为东西文化冲突在不同领域的反映，因此，东西文化问题是新文化运动所要解决的首要的根本问题。

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其中便蕴含着对东西文化差异的认识与选择，在随后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揭示了东西方根本思想的差异：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西洋民族以科学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想象为本位；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442页。

等等。

陈独秀所列举的上述种种差异，不无片面性，在这些差异中，陈独秀特别强调、发挥了第二点，他认为，西方“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①。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一家之人，听命家长，个人无权利，宗法社会的政治、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因此，忠孝是宗法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在这种宗法制度下弊病丛生：损坏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窒碍个人思想的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这与近代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东西文化差异的实质是什么？陈独秀运用进化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文明的历史划分为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认为东西文化差别的本质是时代的差距，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的意义。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别，是为了依据进化的原则，判定优劣，判定孰为“新鲜活泼”，孰为“陈腐朽败”，从而作出文化上的选择，“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② 中国欲进入近代文明，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就必须学习和采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66页：

②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35页。

纳西方的民主和科学。陈独秀以他对东西方根本思想差异的理解、对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过程的反思，指出了中国的大方向，对于辛亥革命后陷入失望、沉思的人们来说，无异于空谷足音。

李大钊等人积极响应陈独秀的观点。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阐述了东西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差异的种种表现等问题，他充分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揭示了东洋文明的种种弊病。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于世界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在应对世界做出第二次贡献。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正视“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应当下决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不同的是，李大钊在宣传西方文化时，又保持了一定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从总体上东方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但是，“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轻于其间”，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他在总体上肯定全面输入西洋文明的必要，主张竭力吸取西洋文明的特长，但是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来说，他认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都是世界进步的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世界未来文明应当是东西文明的融合体。可以看出，他确信东方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西方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总之，在双重的文化危机中，他渴望着新文明的诞生，这一渴望推使他进行新的探求，直

到在五四运动中找到新的归宿。

《青年杂志》创刊前后，民国后开始的帝制和尊孔活动也达到了高潮。1916年8月，国会在北京恢复会议，这时袁世凯已经死去，在宪法会议上就要不要定孔教为国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旧国民党员为主组成的宪法商榷会（后改名益友社）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11月12日，参、众两院中坚持定孔教为国教的一百多议员在北京组成“国教维持会”，通电“吁请”各省督军支持，在此前后，各地尊孔会、社和军阀、政客、宿儒，上书请愿，一时函电交驰，甚为热闹。康有为就上书黎元洪、段祺瑞政府，要求“以孔教为天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礼”。

孔子在我国历史上影响巨大，他的学说几经加工、改造和阐释，已成为中国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如今要定孔教为国教，就是要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定孔学于一尊的思想，给予合法的地位，诚如陈独秀所言，这不但是关系宪法的问题，而且是“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也”。

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看来，政教分途，宪法属于法律范围，不能涉及教育问题，这在西方国家早已是政治的常识，不料我们挂了共和国的招牌，国会议员居然大声疾呼要尊重孔教，在宪法中写入以孔道修身为本，这本身就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在反孔论战中，陈独秀、李大钊都首先注意运用政治学知识，从比较宪法和孔教的性质入手，指出尊孔派主张的荒谬、怪诞，“孔子者，历代帝王

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①在仍挂着共和国招牌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个有力的方法。

在反对孔教的论战中，陈独秀等人一再表达了自由主义的信念：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在他们看来，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思想专制所造成的后果，远在帝王专制之上。

透过宪法与孔教的争论，陈独秀进一步把问题的核心突显出来：孔子之道是否适宜现代生活？在陈独秀看来，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冲突、对立是多方面的，陈独秀明确指出，这些冲突的实质在于，现代生活是要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而孔子学说则“尚尊卑重阶级”，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种种冲突，特别是在根本精神方面的对立，使陈独秀得出一个论断，孔子之道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抛弃，“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因此，他激烈地反对任何折衷调和。

鲁迅在反礼教、反封建的斗争中，也起到了极为显著的作用，他从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出发、深刻地揭露了封建

①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第 258 页。

礼教的罪恶，发出了解放的呼声，他的小说《狂人日记》，是《新青年》上第一篇白话的创作小说，它以特有的深刻性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性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的许多精美的杂文深深地击中了旧社会的弊害，他鞭挞各种腐朽落后现象，呼唤着新生力量的成长。另一位发表了不少反对封建礼教论文的作者是吴虞，他指出礼教是中国家族制度的产物，而家族制度又是专制主义的根据，他根据历史事实把封建礼教和封建法权联系起来，暴露了所谓“礼”早已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此外，他还从经学的角度大胆地直接进攻视为“圣人”被定于一尊的孔子及其学说，所有这些在当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者因此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起正式张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先后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的有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要求：“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等等，陈独秀在随后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把革新文学和革新政治联系了起来，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我国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揭示了他的三大主义，反对“文以载道”，反对八股文的“代圣贤立言”，同时，《新青年》还提倡白话文，它发表文章加以提倡，并发表了一些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新青年》从1918年起改用白话，不久，各地报刊也竞相仿效，连北洋军阀政府也不能不接纳广大教师和

知识分子的要求，于1920年下令国民学校（小学）的“国语”（语文）必须在两年内全部采用白话。《新青年》提倡白话文是与整个思想革命的呼声同时发出的，因而开展得极为迅速。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的狂风暴雨式的攻击使整个思想文化界日益活跃起来，从1918年下半年，在各学校内已有很多类型的社团出现，不少社团办有自己的刊物，其中较著名的有《新潮》、《国民》等。

《新潮》月刊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有少数教员和校外人士参加）组织的“新潮社”所编辑的刊物，“新潮社”的发起人是罗家伦、傅斯年、徐彦之等，初期社员有顾颉刚、吴京、毛子水等二十五人。《新潮》的创办得到陈独秀和胡适的大力支持，校方在经济上加以补助，李大钊和鲁迅都在《新潮》上发表过文章，也提过意见。《新潮》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为自己的英文译名，并且在《发刊旨趣书》中主张“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新潮》表示对封建主义的“恶人模型，思想厉鬼”深恶痛绝，因此“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新潮》以其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反对陈腐的士大夫文学、提倡个性解放和文学革命的论文以及大量的新文艺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主义的旧礼教旧道德，并在文学等领域取得文化变革的实绩，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也激起守旧派的仇恨。1919年3月间，林纾在《公言报》、《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等小说和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乃至谩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旧道德的抨击是“人头畜鸣”，希冀有“伟丈夫”出来镇压新文化运动，针对这股思潮，陈独秀写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把倡导的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明确概括为科学和民主，“答辩书”中说：“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明确表示了反对封建礼教捍卫新文化的决心：“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毛泽东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

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①毛泽东这段话，是就整个五四时期讲的，但也包含着对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肯定。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经过《新青年》、《新潮》及其它支持新文化运动报刊的反复批判，已被越来越多的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所厌弃，与此同时，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乃至各种时髦学说被纷纷介绍进来，知识分子被一个又一个新学说所吸引，形成了一股又一股的群众性思潮，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许多思潮在社会实践的检验下相继显露出它的谬误，直至马列主义成为最吸引群众的学说。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引起变革的回响，教育、文学、史学……，无不以新文化运动为重要标志，而进入变革、收获的新时期。

但是，新文化运动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健康发展。

本书选编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文章 38 篇，另有附录 2 篇，共 40 篇。所选文章主要集中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后期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4 月版，第 660 页。